

China Silk Museum
Guangzhou Museum

华南丝区： 地方历史的变迁 与世界体系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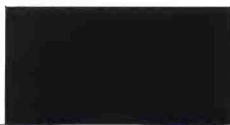
【美】苏耀昌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华南丝区: The South Chilk District:
Local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Theory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方历史的变迁 与世界体系理论

【美】苏耀昌 著



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
与世界体系理论

(美) 狄德吕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花园路64号楼)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8印张 183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册

ISBN7-5348-0007-2/K·2

统一书号：11219·87 定价：2.20元



序

叶显恩

本书作者苏耀昌博士，任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系。1985年6月，苏耀昌博士访问广州时，应广东省历史学会的邀请，作了一个关于顺德蚕丝县与世界市场取向关系的富有启发性的学术报告。他在区域性的历史研究如何与历史的整体相联系，以及历史学如何引进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方面的见解，给与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苏博士的这些见解，已经体现在他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书之中。我觉得他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也是我国目前史学界需要认真探索的问题。

人类社会的历史，固然有其客观的运行轨迹可寻，但它却呈现出光怪陆离，繁杂多变，各地区间又显得千差万别。因此，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和区域研究，是撰写汇通性历史整体的必要前提，也是最佳的途径。各地区之间的历史，是互相联系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联系的总趋势是愈来愈密切，愈来愈广泛的。所以，区域性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本区域狭窄的小天地，必须放眼于历史的总体。

中国的远古时代，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便日益频繁，

日益扩大起来了。以广东而论，战国之前已与中原有经济、文化交往；秦汉时期，与中原的联系有了进一步加强，并且已与南海各国相往来，甚至经此转口与印度和交通了。明中叶以降，广东沿海地区与南海对岸诸岛国，凭借舟楫可通商货，经济上的联系，敬诸岭北各地，有过之而无不及。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沿海与海外的联系，更是遍及各大洲了。因此，广东明清史的研究，不仅要顾及中华民族历史的总体，而且要放眼于世界历史的整体。然而，目前国内尚缺乏这方面经验性的研究。苏博士的这本书正是把华南土丝产地置之于世界历史的范围内来加以考察的。他既注意华南土丝产地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动及其对社会变迁的作用，又把华南土丝产地同世界市场取向联系起来，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国家的政治经济侵略联系起来，一并探讨。这种把区域性的历史与世界历史整体联系起来研究的方法，使我们发生了兴趣，并且希望介绍给中国的广大读者。

如前所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繁多多变的。研究复杂的事物需要相应多样化的方法。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直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中国的历史学基本上采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主线论的研究方法，因而，一部本是多彩多姿的历史，被歪曲成一部简单的革命政治史。这显然是受“左”的政治路线影响的结果。随着“左”的政治路线的结束，学术的春天已经来临。我们正面临着从研究革命、政治转向研究整个社会。客观需要我们借鉴或引入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方法。历史学和社会学各有其研究的范围和分工，但都共同以人类社会为其研究对象。彼此间本应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然而，社会学家往往以历史学沉溺于细微不足的描述，忽略概括社会发展的构架和模式，觉得没有意义而不屑一顾；历史学家又认为社

会学家尚未将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便轻下结论，急于建构模式和原则，因而也往往投之以鄙视的眼光。彼此各持一端而相轻。近年来，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已开始感到各自的不足，希望两者相结合，互相取长补短。历史学如何引进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是我们所感兴趣的课题。从本书看，作者因出身于社会学，固然重视理论构架的运用，追求社会历史经验规则的发现和解释，但又不忽视特定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过程的描述。可见他是力图将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使之起互补的作用。苏博士由社会学而兼治历史学，力图把两者结合的研究方法，恰恰是我们所要借鉴的。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把本书介绍给我国读者的又一个原因。

了解外国学者的史学理论的见解，固然必不可少；但如果再阅读利用这些理论写作的史学著作，当然更有效。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产生了将苏博士这部著作翻译出版的念头。值得庆幸的是，当我把这一想法同史学界的朋友商量时，得到了同仁的支持。正在厦门大学攻读傅衣凌教授博士学位的陈春声先生，欣然表示愿意承担翻译，又得到热诚于中美学术交流的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慨然答应出版。本书就是这样在各方面的支持、帮助下得以同读者见面。

作者自称，本书运用世界体系的理论和动态的阶级斗争方法，研究华南土丝产地的历史变迁，力图回答国际上汉学研究中有争议的五个问题，即关于中国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性质问题，土绅是创新还是保守的问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动态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和反动性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作者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魔爪伸入华南土丝产地之前的社会形态及其之后所引起的社会变迁过程，按其历史顺序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卷入、农业商业化、工业化、

无产阶级化和周期性发展”等六个步骤，逐一进行论述。苏博士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不乏精辟独到之处。例如，他把华南土丝产地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置于多种矛盾的焦点之中进行考察，既考虑外力侵入与内力反应的这两种势力的互相激荡，又注意到该地区内部阶级结构的调整及其斗争所起的作用，以及随着机器缫丝业的兴起而出现的无产阶级所采取的斗争方式、特点等方面的见解，都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分析力而给人以启发。还需要指出的是苏博士在书中运用的资料是丰富的。他不仅征引了大量的中外文资料，而且还几度到实地考察，搜集了不少口碑传说资料。以在当地考察得到的主观感受和体验，启发对文献记载的理解。正如他所说的，当他到实地考察后，对文献记载顿然敏感起来。他这种广辟资料来源，把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值得称道的。从书中引用资料的丰富、广泛、多样，可见作者不仅付出了艰巨的辛勤的劳动，而且对问题的探索是认真的。

本书还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流行的世界体系的理论，以及运用这种理论进行地方史研究的得失，提出了作者补充的意见。每一章的后面都开列有中外的参考书目。这些对我们了解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情况，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它是没有国界的。因受国度、民族、阶级等等因素的局限，历史学家对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是在所难免的。只要认真研究、尊重史实，态度坦诚，得出不同的结论，皆应受到尊重。随着各国历史学家间交往的频繁，联系的加强，商讨的密切，自当互相取长补短，分歧也自然随之而日见缩小。本书所力图回答的前述的五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在西方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方历史学家的某些观点，包括本书

的某些观点在内，我们自然有不同意或不尽同意之处。但是，它可以使我们从中受到启迪，或激发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提高我们的认识。

尚需说明的是，为方便起见，编者对本书的中文版逐一进行了技术性的变动。

承本书作者之雅嘱，书此，是为序。

1986年12月于广州康乐园

图 表 索 引

表 1 1760—183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量

表 2 广州丝的出口量

表 3 顺德县的水路运输

表 4 广东省生丝年平均产量和出口量

表 5 华南手缫丝和机缫丝产量

图 1 珠江三角洲的丝产区

图 2 珠江三角洲的沙田

图 3 珠江三角洲“塘四基六”的生态体系

图 4 手摇缫丝机

图 5 蒸汽缫丝机

图 6 脚踩缫丝机

图 7 阶级与身份集团

致 谢

本书最初是作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的博士论文而写作的。因此，我想对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主席成露西博士表示谢忱。从她那里我学到了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最有成效的方法，如果说我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创造能力有什么进步的话，那是得益于她孜孜不倦的指导。成博士一直鼓励我把自己不成熟的观点写成一篇论文，乃至一部专著。

作者对本书有关问题的了解，也得益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许多才识过人的老师的指点。黄宗智博士从历史学的角度指导我研究汉学文献；约翰·霍顿（John Horton）博士使我对马克思主义；通过缪尔·萨拉斯（Samuel Sarace）博士的指点，我学习了发展理论；比尔·罗伊（Bill Roy）博士引导我进入历史社会学研究领域。莫里斯·杰特林（Maurice Zeitlin）博士在其研究生讨论会上富于启发性的宏论，则常常使我重新考虑阶级、政府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佩里·林克（Perry Lick）博士和琳达·奈尔逊（Linda Nilson）博士阅读过本书的大纲，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的许多朋友阅读过本书的初稿，并提出许多有洞察力的批评。我愿借此机会对夏明德（Lynda Bell）黛安娜·戴维斯（Diane Davis）、高耀中、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莫里恩·摩根（Maureen Morgan）、费南德·

帕拉(Fernando Parra)、凯茜·沃克(Kathy Walker)和叶汉明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本书写作的最初阶段所给予的宝贵支持。我特别要向叶汉明表示深深的谢意,她曾细心地阅读过这本书的最初几稿。

以下先生为本研究的资料搜集工作提供了许多帮助:斯坦福大学的陈明球和关文斌先生,香港中文大学的蒋英豪先生,洛杉矶校与中国学术交流计划负责人范苏女士,广州中山大学的刘玉遵教授、陈国强教授、叶显恩教授和谭棟华教授、华南农学院的梁嘉勉教授。我曾到顺德县的丝厂、蚕茧收购站、蚕丝研究所和人民公社(原文如此——编者注)进行实地调查,我在顺德的亲属为此提供了大量方便。

在修改这部书稿准备交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过程中,承蒙沃里·戈德弗兰克(Wally Goldfrank)博士、哈根·科(Hagen Koo)博士、哈里·兰普利(Harry Lampley)博士、罗曼·迈尔斯(Ramon Meyers)博士、莫里斯·里切特(Maurice Richter)博士、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博士、费德里克·威沃(Federick Weaver)博士、还有两位不知名的评论者阅读全稿或部分章节。赫伯·巴林格(Herb Barringer)博士、乔·利昂(Joe Leon)博士、清池田博士就本书的出版问题发表了意见。我深深地向这一切表示谢意,所有这些评论、建议和批评都大大提高了书本的质量。然而,和往常一样,我并未能接受老师、朋友和同事们的全部忠告。因此,文中的任何错误均由作者自负。

一九八五年炎热的夏天,我每周都与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系的李中泰和史国雄先生研讨问题,与这两位聪颖的研究生进行的富有成效的讨论,对于我系统地阐述阶级分析方法帮助甚大。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的米歇尔·马丁 (Michele Martin) 博士经常提醒作者按时完成对这部书稿的修改，鼓励作者严肃地对待评论者的批评。为促进本书稿的修改，他作了许多出色的工作。

此外，我想感谢我的妻子陈美玲。没有她的忍耐、牺牲和坚决支持，我很怀疑自己能否完成这一著作。我十分愉快地将此书奉献给她。

最后说明，本书在国内出版，得力于叶显恩先生的竭诚帮助，陈春声先生的精心翻译，中州古籍出版社庄昭先生的热情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提 要

关于第三世界发展的研究领域，世界体系理论由于忽视阶级的重要作用，把边缘地区看成世界体系运动的被动的牺牲品，没有详细说明世界体系的动态与地方力量的交叉联系，而经常遭到批评。针对以上问题，本书把世界体系动态与地方力量结合起来，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地方发展。作者认为，在研究地方性发展时，为了充分了解一个地区的发展道路，有必要追溯历史，考察这个地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农业的商业化，工业化与无产阶级化的途径和周期性发展的模式。本书根据上述计划，研究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蚕丝产区政治、经济的变迁。第二章评述了以往对蚕丝产区的研究。第三章研究了华南士绅地主所有制这一社会形态的历史根源。第四章追溯了华南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独特途径，说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士绅阶级对外国入侵的顽强抵抗是如何影响这一途径的形成的。第五至第七章考察了世界体系动态与地方阶级力量互相作用，导致华南出现商业化的小生产者模式，乡村迅速工业化并发生自梳女运动这一历史进程。第八章研究了蚕丝产区的周期性发展，解释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表产阶级改良运动失败的原因。第九章是全书的结语，综述这一研究工作对世界体系理论、阶级理论和汉学研究的贡献。

F329

15

3

5421127

目 录

序

图表索引

致谢

提要

第一章	世界体系理论与地方性研究·····	(1)
第二章	华南蚕丝产区·····	(29)
第三章	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43)
第四章	卷入·····	(85)
第五章	农业的商业化·····	(116)
第六章	工业化·····	(145)
第七章	无产阶级化·····	(175)
第八章	周期性发展·····	(198)
第九章	结论·····	(226)
附录	衡制与货币换算·····	(239)
编后语	·····	(240)



461024

第一章 世界体系理论与地方性研究

沃尔斯坦 (Wallerstein) 的世界体系理论 (1976, 1979, 1984)*, 已经对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传统社会学的一些重大问题, 如历史与政治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资本主义与世界性劳动分工的关系, 阶级和国家在世界体系发展中的作用等等, 都重新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合法地位, 这必须归功于沃尔斯坦的努力 (弗里德曼, 1980)。用查鲁特 (Daniel Chirot) 和霍尔 (Thomas D. Hall) 的话说, 沃尔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已经“吸引了新一代社会学家的想象力” (1982)。在世界体系理论的指导下, 建立了新的研究中心, 创办了新的学术刊物。世界体系学派一年一度举行学术讨论会, 发表会议的论文。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从社会学开始, 现在已扩展到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 (赫切特, 1975; 查鲁特, 1976; 默尔德, 1977; 卡柏兰, 1978; 戈德弗兰克, 1979; 霍普金斯和沃尔斯坦, 1980, 1982; 鲁宾逊, 1981; 弗里德曼, 1982; 柏格森, 1983b; 汤普森, 1983; 纳什, 1981; 蔡斯·邓, 1982)。

沃尔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对社会学研究作出了以下意义深远的贡献。首先是独特的历史方法。由于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年鉴

* 本书所有括号中的年代, 除特别注明者外, 均表示有关论著的发表时间。论著的标题、出版地或发表的刊物等具体内容, 请参阅各章最后的“参考文献”——译者

学派的强烈影响，沃尔斯坦把社会存在看成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1984）。他指出：“我们总是尽力用自己的术语去描述运动着的现实。结果，经常因此忘记所谓现实的变化只不过是一种被我们抽象了的变化。”为了把握这一不断变化的现实，沃尔斯坦提出要研究“假定的长时段的、大规模的总体，只有在这种总体内部，各种概念才有意义。这种总体在时空上必须具有某种相对的自主性和完整性。……我称之为‘历史体系’。……这一体系必须具有自己的历史，必须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毁灭、瓦解、转化）的过程”（1984）。沃尔斯坦断言，在大学里，社会科学按照严格的界限被分为不同的学科，但是这种常见的分科是不能够理解这个历史体系的。他提倡社会科学研究三个新原则：

“重视较长历史时期和较大空间范围的经济分析，把社会过程和历史过程统一起来，注意理论的过渡性（即启迪性）。”（1977b）

沃尔斯坦运用这种历史分析模式，建立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理论，从而作出了又一个有意义的理论贡献。^① 沃尔斯坦主张分析历史的总体，他真正的创新在于选择整个世界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他主张必须从世界体系的观点出发进行历史解释，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看成世界体系与局部地区互相作用的结果。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假定分析的单位是这样一个世界体系，而不是国家、民族或种族，那么结果就会有很大不同。我们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把注意力从各国的内在特点转移到其相互联系的特点上。我们不再把阶级（或阶层）看成国家内部的集团，而是将其视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集团。”（1976）

此外，沃尔斯坦对“半边缘”概念的系统阐述（1984），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开拓了新领域。与人们所熟知的中心——边缘两极背反的依赖模式不同，沃尔斯坦的模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

中心与边缘中间加进了一个半边缘层次。这个三层的模式使他能够解释边缘上升为半边缘，半边缘上升为中心的可能性；也能解释中心下降为半边缘、半边缘下降为边缘的流动性。由于在模式中有了半边缘这个中间层次，世界体系理论就有可能研究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经常变化的矛盾和危机，这种矛盾和危机正是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结果，沃尔斯坦的三层模式避免了这样一种宿命论的判断：即以为由于中心经常剥削边缘，所以边缘注定是不发达的。

沃尔斯坦的贡献还在于详细描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动态。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是通过结合、农业商业化、工业化、无产阶级化这一长期趋势得以发展的（1984）。结合指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外扩张，使新的边缘地区逐渐卷入世界体系的过程。某个地区一旦被卷入，其农村就逐渐发展起以出口为目的的经济作物，原料被加工成半成品以供中心国之需，直接生产者生计被迫出卖劳动力（长年或短期的），这样，资本主义关系的强化过程重新开始了。与这一长期趋势相伴随，由于世界性商品供求的不平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出现扩张和停滞的周期性变动。沃尔斯坦称为A段的扩张和B段的停滞大约每四十至五十年交替出现一次，每次交替都有助于把世界经济重组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最后要提到的沃尔斯坦的贡献是，他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各个主要因素间长期的相互作用，这些要素包括阶级、种族集团、民族集团、身份集团、家庭和国家。他认为这些要素远不是原生的和先验的实体，而是互相依赖，互相关联的存在；远不是离散和孤立的，而是以复杂和矛盾的方式不可分离地缠绕在一起。例如，就政府这个要素而言，沃尔斯坦指出：“阶级、种族